



春天的故事

——记 1979 年清华校庆

○袁 帆（1975 级建工）



张维副校长（左）与校友亲切握手

有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叫《春天的故事》，第一句是“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曲，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1979年那个令人难忘的春天，那个属于中国、属于清华，也属于我的春天。

对清华而言，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都会迎来建校纪念日。在清华百年风云变幻中，除了因为历史原因而中止外，春天里的“校庆”从来都是全体清华人为母校庆生的盛大节日。

1979年是清华大学建校68周年，那年的校庆为何值得特别记载，发生过什么感人的故事？我为什么对那个校庆记忆犹新？请让我用历史资料的回顾和亲身经历一一道来。

给台湾清华校友的邀请信

1979年3月27日，清华大学召开校务会议，在做出的几项决议中，第一项就

是：“决定恢复校庆，4月底最后一个星期日，邀请部分知名老校友返校，邀请北京市重点中学部分应届毕业生来校参观，并发函邀请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派人来校参加校庆活动。”

根据这项决议，学校在4月2日向台湾清华大学师生和校友们发出了派代表来北京，进行“参观访问、进行学术交流”的邀请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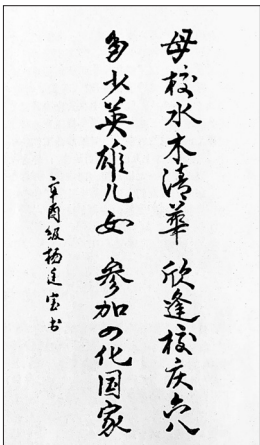
这种“清华一家”的格局与理念，不仅成为45年来，乃至此后更长时间两岸清华交流的历史性基础与起点，也给1979年的清华校庆增添了“祖国和平统一”的深刻含义。

1979 年校庆精彩撷英

1979年4月29日，纪念清华大学建校68周年校庆正式举行。中断12年又重新得以恢复的这次校庆，注定是一次令人百感



吴良镛先生（右1）与校友们亲切交谈



一九二一级杨廷宝先生的贺词

交集的校庆，是一次充满欢声笑语的校庆，是一次振奋人心的校庆。

1921级（辛酉级）毕业生、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因故没能回校参加校庆，但他挥毫落纸，写下对清华建校68周年的热烈祝贺：“母校水木清华，欣逢校庆六八；多少英雄儿女，参加四化国家。”

上午8时，西体育馆前欢声如潮，一年一度的全校田径运动会在壮观的开幕式之后全面展开，学校新建的电化教育中心、图书馆、各系馆的主要实验室一齐开放。9时以后，各路校友陆续到校，接待站播放着欢乐的乐曲，接待人员为老校友们佩戴上写有姓名和年级的红色签条，在清华园中已经十几年没有出现过的这一幕，让所有校友们心情豁然开朗，顿时有了“回家”的美好感觉。

这一天，姚依林、周培源、荣高棠、于光远、高沂、张健、胡启立、任之恭、袁翰青、彭珮云等知名老校友，与千余名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一起返校参加活动，刘达、张维等校领导和师生代表在各处迎接

久别重逢的校友们，工字厅、主楼接待室、大礼堂、图书馆、荷花池畔、草坪周围，到处是亲切的问候，倾心的交谈，笑语欢声的难忘镜头处处显现。

毕业五十年的“一级”老大哥

在清华历史上，1925年开办了大学部，这是从留美预备学校向“完全大学”迈出的实质性第一步，这一届招收的学生史称清华大学“一级”，1929年共有82人拿到毕业证书。1979年，恰逢“一级”毕业50周年，因此这些特殊的历史见证人成为校庆聚焦的重点。此次回校的都是在北京的老同学，共有近20人，他们从知道母校恢复校庆的消息起就相约，一定要返校参加庆祝活动。

这些“一级”老校友当时都已经年过70岁，其中有一位已下肢瘫痪，但仍然坚持坐轮椅参加活动，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家袁翰青（1905—1994）。他们一起去看了50年前毕业时亲手种下的松树，祝愿母校像青松一样茁壮成长；他们一起瞻仰了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韦杰三烈士纪念碑——断碑，缅怀逝去的激情岁月和同窗好友，心生无限感慨。



毕业50周年的清华一级老校友合影

海外归来的清华游子

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一批定居在海外的清华游子得以于1979年回国参加母校的校庆活动。在他们中间，有物理学家任之恭（1906—1995）和同为清华学子的夫人陶葆桢、科学家与社会活动家张捷迁（1908—2004）、物理学家张守廉（1920—2013）等杰出老校友。

张捷迁遇到了时任热能系教授的老同学董树屏（1909—2000），俩人又一起在工字厅接待室看望了他们的老师：1922级的彭开煦。那时，彭老学长已经79岁，但他仍然在自动化研究所坚持工作，这与他在清华学校念书时曾是校足球队队员、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有着密切关系。就在他们师生叙谈之际，常年坚持体育锻炼的水利系教授、1923级的施嘉炀（1902—2001）走了进来，彭老学长对施教授说：“你的身体真好，咱们都是沾了体育活动的光。”

多年未归的海外游子，这一天在清华园中留下了许多佳话。一位从澳大利亚归来的女校友饶有兴致地登上大礼堂的舞台，她就是十级经济系校友徐萱（1934年入学），在校时曾是文艺社团的骨干。非常巧的是，1936年4月29日，她就是在这里扮演了话剧《南归》中的女主角“春妞”，给许多老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她那时当然不会想到，竟然能在43年后的同一天重登清华舞台。激动之余，她再次拍下一张剧照留作纪念。

梅师母流下激动的眼泪

在清华的历史上，梅贻琦校长为清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1979年回校参加校庆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中）会见老校友

的许多老校友都曾亲身受到他的教育思想感召。这一天，他们与时年87岁的“梅师母”韩咏华再次见面。

这是梅夫人在时隔30年后第一次回到清华园参加校庆，当她来到工字厅时，刘达校长迎至庭院表示诚挚的欢迎。任之恭夫妇等亲切地称呼她“梅师母”，向她转达海内外校友的问候。梅夫人向大家说：“一走进清华园，我就激动地流出了眼泪，过去真想不到还能再回清华，又看到这样多的老朋友，你们大家都在这里，叫人真高兴。”

梅夫人在工字厅与许多老校友见面后，又参观了大礼堂、图书馆、旧北院等校内原有建筑物，并特别探访了她过去居住过的老房子——甲所。她深情地说：“清华的变化真大，盖了这么多的新楼，栽了这么多花木，要不是看到这些旧房子，我完全认不出原来的模样了。”

梅夫人的话也代表着清华人的感情，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为了清华的发展曾经付出巨大心血与努力的一代代清华前辈们。

大礼堂前高歌的一代清华革命者

校庆日的上午，一百多位1946—1949年期间的清华校友在大礼堂前相会了。他们大都是当年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

子，有彼时地下党总支书记、外文系的查汝强，学生支部书记、社会学系的彭珮云，学生会主席、物理系的杨坤泉；还有“剧艺社”“民舞社”“大家唱合唱团”等群众团体的成员，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中的纠察队员。

这些当年在不可回避的社会矛盾中坚持政治理想，不畏强权，努力抗争的热血青年们，后来许多都是从清华园走向革命道路，30年后旧地重游，自然个个感慨万千。而他们中间留在清华长期工作的何东昌、艾知生、李传信、滕藤、何介人、李卓宝、张思敬等，在校园里又与昔日战友相聚，更是激动。他们长久地使劲握手，互相叫着学生时代的“绰号”，表达不尽久别重见的喜悦心情。

当大家站在一起准备合影时，队伍中有人高声提议：“我们应该唱歌呀！”这个提议立刻得到大家回应，“就唱我们在这儿唱过的歌！”于是，当年“大家唱”的两位指挥——时任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的方堃（1922—2020）和北大西语系副主任严宝瑜（1923—2020）站到了队前，他们挥起有力的臂膀，队伍中顿时爆发出激昂的歌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这歌声唤起了属于那一代人的青春活力，把大家又带回到了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这歌声蕴含着对母校的深切情谊，也表达了大家对革命事业无怨无悔的坚强信念，不少人都伴着歌声流下了热泪。这动人的一幕，也被永远定格在镜头中。

身处黄金时代的建设者

1979年校庆返校人数最多的当属1949

年以后入学、1970年前毕业的学子，达到近800人。他们都是在新中国成长、上大学、毕业、走向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都处在年富力强的黄金时代，回到母校，就像回到了娘家，立刻受到在校同学和老师的热烈欢迎。他们在一起怀念沸腾的学校生活，一起畅谈在“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理念感召下刻苦锻炼身体的体会，一起切磋在各自工作岗位上遇到的专业问题，一起憧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美好愿景……

恰逢毕业20周年的1959届返校同学有着特殊的感受，机械系毕业生丁品祥即灵感赋曰：“一别清华二十春，重返母校格外亲……”许多远离北京无法回校参加校庆的同学，也纷纷发来贺信、贺电，表达他们对母校的美好祝愿，“敬祝母校，光华灿烂；长征四化，多作贡献。”

我与1979年清华校庆的不期而遇

“1979”对1975级而言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在经过近4年的学习之后，我们于1979年4月毕业离校。《清华大学一百年》中这样记载：“4月10日，本年春季毕业典礼举行。1975年入学的2200多名学生毕业。学校授予5名学生‘优秀毕业生奖章’、61名学生‘学习优良奖状’。”我是5名优秀毕业生奖章获得者之一。

怀着对清华学习生活的留恋，怀着对未来跃跃欲试的忐忑，1975级毕业生于4月20日之前离校，开始踏上各自的人生之路。本来1975级与1979年校庆“擦肩而过”，略显遗憾，但我却由于一些特殊情况没有马上离京，因此竟然与清华建校68周年校庆不期而遇，成为见证这次历史性

□ 史料一页

校庆的幸运者。

其实，在清华学习生活近4年时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清华的发展历史，我对清华过去60余年的了解，完全是道听途说，以及不经意间的偶然所获。因此对校庆是怎么回事，我心中充满好奇。

4月29日星期日，我一早就来到西大操场。因为在校学习期间，我是学校体育代表队的长跑队员，曾连续三年参加过学校运动会和高校运动会，所以对上午举行的“清华大学第22届田径运动会”并不陌生。但这次来到运动会赛场，我的身份已经大不一样，看着熟悉的跑道和运动员们，尽管技痒也没有资格再上场一显身手，那种滋味并不好受。加之那次清华田径运动会是1976级、1977级和1978级三个年级，当时在校生只有约7000人，但参加比赛的学生运动员达到900多人次，展现出非常雄厚的群众体育基础。了解这种情况后，我这位老运动员对学弟学妹们还是充满了信心，为他们加油助威，希望他们能继续让清华体育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

观摩了运动会开幕式和部分比赛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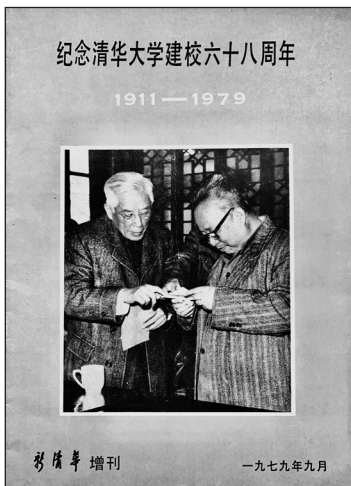
后，我离开了西大操场。此时在校园内可以见到不少老校友，他们胸前都佩戴着红色的标志条，虽星星点点，却络绎不绝，成为清华园里十几年里都未出现过的一道风景线。

当我来到设在二教附近的校庆接待站，看到不少老校友在进行登记，并佩戴上写着自己姓名的标志条。虽然当时因为阅历太浅，对于隐藏在标志条背后的各自人生“酸甜苦辣”并没有多少体会，但那种兴高采烈的气氛还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之后的多少年里，每当我在各种校庆活动签到时，脑海里都会不经意间浮现出1979年清华校庆时看到的难忘场景。

我也听到在大礼堂前有许多老校友在唱歌，但那时根本没有意识去弄清楚唱歌人都是谁，以及他们所具有的特殊经历。如果当年我就有今天已经具备的能力与意识，我一定会让他们留下每个人的签名，那将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华文物”。

后记

一本《纪念清华大学建校六十八周年》的专刊唤醒了我的记忆，也不免生出些许遗憾。当年由于资历尚浅，在难得的校庆中与众多的知名清华老前辈擦肩而过，从此再也无缘与他们当面交流，一睹他们的时代风采。这本资料虽然在出版44年后才来到我的案头，但对我来说仍然至关重要，它让我能有机会以今天所具备的眼光，全面审视1979年那次承前启后的清华校庆，将许多记忆碎片拼接成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我有时会突发奇想，如果AI等高科技成果真能够实现“穿越”，那我一定要重新回到1979年那个难忘的春天，再现一个更加完整、动人的校庆故事。



《纪念清华大学建校六十八周年》专刊，封面图为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右）和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